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 方法和新趋势¹⁾

齐茨 (D. M. Keats)

澳大利亚纽卡索大学

方富熹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本文论述了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研究所依据的方法学原则以及当前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

一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但只有在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才获得蓬勃的发展。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起是跟世界上近年来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频繁交往,使心理学家日益迫切地感到,需要研究不同文化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过程和特点有何异同,以便增进人们间的相互理解。

对儿童抚养的实践和学校教育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儿童是未来世界的主人,而对新一代教育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发现和利用。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能使我们验证在某地观察到的儿童心理现象或行为是否在各处也普遍有效或部分地有效,抑或它仅发生在一个现代化社会或传统封闭的社会?这一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实践意义。理论上我们承认心理发展是环境与遗传相互作用的产物,但环境和遗传两者是怎样的关系,它们是怎样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地决定心理发展的?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跨文化的研究;在实践上,无论研究本国的教育改革或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都必须具深刻理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儿童心理发展的共性及其差异,无怪乎具有国际影响的皮亚杰学派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等多年来是跨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

Kagitcibasi和Berry(1989)^[1]曾给跨文化心理学的对象问题下过一个概念性定义:“跨文化心理学是研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集团中个体的心理社会机能的相似性和差异。它力图发现(1)在个体水平上的心理变量与(2)在总体水平上的文化、社会、经济、生

1) 本文于1990年8月17日收到。

态和生物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探讨个体对变化中的总体变量的实际经验。”

研究心理社会机能的文化差异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但探讨心理社会机能的普遍性或相似性目前被提到更突出的地位。从定义中可以看到跨文化心理学家更关注社会文化背景,生态学,社会结构等宏观特点并力图弄清它们与微观变量(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使他们能站在一个更有利的立场上找出哪些个体心理特点是文化特殊性的现象,哪些特点是在几种文化背景中共同性的表现,哪些特点是普遍的人类现象。跨文化心理学家认识到现代化的进程对人们的生活,从而对人们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强调个体心理变量对总体社会文化变量依存关系的动态变化研究。

发展心理学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将着重谈谈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重要方法学原则及当前的研究和发展的趋势。

二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也应用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调查、问卷、访问谈话、现场实验、实验室实验和个案研究等。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背景,有时还需要分析人种史的资料。有些国家已建立了“人类关系地区档案”(th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提供了这方面极有价值的资料。跨文化的研究是应用一种比较的方法,力图将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分离开来,其目的是为了考查各种心理产物、理论、行为模式和研究发现的普遍性。其中一种方式是运用相同的方法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重复测查来自另一种文化环境的理论或模式。另一种方式是更广泛地关注非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各种有价值的心理学概念和资料,并将它们与主流的西方心理学理论联系起来^[2]。

跨文化研究既然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跨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在方法学上占有中心的地位,可比性的必要前提是文化的对等性,即从不同的文化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及其处理方法具有文化的等值性。Malpass和Poortinga(1986)^[3]曾区分出三种文化等值性:机能等值,这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问题作出反应时产生的行为表现出基本相同的心理机能;概念等值,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特定的刺激物的意义有共同的理解;测量的等值,即从不同的文化中获得的数据资料的测量的特征展现出一种可比较的模式。下面,我们将具体考察满足跨文化可比性要求的有关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可作为评价跨文化研究方法上的标准。

1. 所研究的现象的对等性问题: 这是指我们所研究的行为现象在作比较的每一种文化中是否代表着基本相同的心理机能。相似的行为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机能或不相似的行为表现出相同的机能。这在心理病理学中是屡见不鲜的。Dragannes(1986)^[4]曾举出一个抑郁症的研究例子。虽然广泛认为抑郁症的特征是悲伤、焦虑、紧张,对事物不感兴趣,注意力不集中等,但这些特征仍存在着重要的文化差异。例如自罪(guilt)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在黑非洲的南撒哈拉人并没有自罪的表现,但在西方和日本的患者中自罪是抑郁症的重要成分。日本患者谴责自己直接冒犯了某些人,而德国患者则责备自己破坏了抽象的道德原则。如果不能说明这种与文化有关的差别就可能導致误诊,即把文化上并非异常的行为看作是异常的,反之亦然。

2. 对所比较的对象分类时,使用的分类系统的机能对等性问题。这涉及到分类的标准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可能导致概念理解上的差异。例如对色谱中的不同颜色作分类命名时,在不同的文化中尽管使用的是同一色谱,但以每种颜色指称的色谱区域则可能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在主要颜色之间的过渡地带要区别出是什么颜色是很困难的。例如,某一种颜色究竟是绿蓝还是蓝绿就很难确定。在英语中蓝绿结合就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分类的方法将直接影响跨文化研究中对被试的选择。例如在西方通常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将人们分类,而在印度,由于种姓等级制度的特殊重要性,这种分类方法就未必行得通。又例如关于家庭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系已进行了很多研究,在这类跨文化研究中,如何对家庭下定义,家庭构成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这既包括成员的结构关系,也包括感情关系,理解不同,将影响样本的取样问题,从而影响样本的可比性。

3. 样本的可比性: 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这一问题特别重要。在发展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中涉及年龄和儿童所在学校(或班级)的水平。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某一国家中只有经过精选的一部分儿童能进入中学,而在另一个国家则全部适龄的儿童都能进入中学,这样随机抽出的样本对前者较为有利。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考虑儿童出身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时,必须将文化或种族的影响与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区别开来,虽然这两者都决定生活方式,从而决定心理变量。例如Cashmore和Goodnow(1986)^[5]发现盎格罗—澳大利亚母亲与意大利母亲存在着显著差别,但当考虑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指标时,这种差异减少了。由于社会阶级的指标在各国变化很大,准确地匹配比较经常不可能,但为了使跨文化的比较有意义,必须尽可能弄清有关的社会阶级指标,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将样本之间的差异笼统地归因于种族的或文化的差异。换言之,如果不能适当地处理社会阶级这一变量,就不能假定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独立的变量。

4. 测验和任务的可比性问题: 这是指一个测验、任务、问卷、量表或实验室实验在作比较的文化中是否具有相同的功能,即是否具有功能的对等性。首先被试的样本应该是合适的,其次在测验或任务的内容上(包括一般主题或个别项目)也应是合适的。在某些跨文化研究中简单地移用别国的有关量表作为本国的测量工具,其信度和效度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些测验工具的常模的可比性问题还必须仔细地加以检查。

5. 程序的可比性: 这一问题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数据结果的可比性。例如许多研究者都喜欢采用问答的方法。但我们知道,某些文化社会并不鼓励儿童轻易地回答成人的问题,除非他们对自己答案的正确性确有把握。然而,另一些文化社会则鼓励儿童在不会时也要大胆“猜测”。如果把儿童的答案分成“正确”和“部分正确”两种类别来打分,然后再作对比,显然所打的分数将不利于前一种文化社会的儿童。程序问题涉及到实验的程序,被试取样方法,数据结果的处理,主试的选择培训和遵守通行的文明准则等等。

6. 动机的可比性问题: 如果研究者或被试的动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么两组跨文化的数据在机能上是不等值的。为此,参加研究的双方应对研究工作达成协议,并看到双方的利益。关于被试的动机则较难控制,如果研究任务或程序缺乏文化关联性,对实验程序缺乏理解,取样不合适,或对研究的问题不感兴趣,都可能导致被试动机上的差异,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效度。

7. 言语的可比性问题: 首先这一问题是指用某一种语言表达的概念能否用另一种语

言准确恰当地表达出来,其次是翻译工作的水平问题。为了保证翻译的质量,反译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即得到某一种语言的译本以后,再把译本反译成原来的语言,跟原文两相对照,如有出入,再重复上述过程。应用这种方法时,对每次的翻译都应独立地进行。

关于跨文化的研究方法,最后还应谈谈主位研究方式(emic approach)和客位研究方式(etic approach)的论争。这在跨文化的文献中已讨论过很多^[6-8]。所谓“主位研究方式”是指站在主位的立场上仅对自身一种文化进行研究,这是本土心理学家所提倡的,从定义上看,这不是一种跨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客位研究方式”则是指站在外部客位的立场上对两种或几种文化进行研究,并在文化上比较各种有关的行为。从理论上说,最好的跨文化研究方法是由所涉及的有关文化的心理学家共同组成一个研究小组。由于小组的成员最熟悉本民族的文化,也具有本民族的丰富学识来解释所收集到的数据资料,并且也能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将在各种文化中收集到的数据资料互相比较,这样有助于克服种族偏见。例如本文的作者曾合作进行过一项中澳儿童对智力概念理解的跨文化对比研究^[9,10]。这项研究的第一步是在中澳两种文化的各方中收集探查性质的数据,这是一种主位研究方法,然后依据这些数据设计出一个共同的实验再回到中澳两国中进行,将收集到的数据作比较,这是一种客位研究方法,这样把两者结合起来,从而得到较有价值的研究结果。

三

关于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近期动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

(一)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

尽管对儿童心理发展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上公认的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行为主义的社会学习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及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等等只不过各自从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一个侧面作了理论概括。这些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有待于得到更多的跨文化研究的支持。近几年来有些跨文化发展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关于儿童发展的理论见解。例如Super和Harkness(1986)^[11]将生物学的“生态小生境(ecologie niche)”的概念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相类比,提出了“发展的小生境”的概念作为理论框架以研究影响儿童发展的文化结构。它包含三种成分或子系统:物理和社会环境;儿童照管和抚养;照管人的心理学。他假设存在着一个自动平衡的机制整合着这三个子系统,使它们适合于儿童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它们也与更大的文化、生态环境相互作用。依据这一观点Dasse(1988)^[12]进一步提出关于研究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的范型,即把正在发展的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发展的单元。利用这一范型,他观察了非洲儿童的发展,例示了“发展小生境”的第三种成分即照管人(或父母)的心理学是怎样影响儿童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如对服务的准备性等社会关系技能的发展与对手的操作技能的发展的影响等。

Shand和Kosawa(1985)^[13]依据儿童的社会化是成人和儿童共同参与的过程的理论设想,比较了日本和美国的婴儿与母亲的相互作用,探查是母亲单方面的行为在塑造婴儿的行为或是一个行为相互塑造的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婴儿(样本总体)出生时的活动水平和母亲的行为与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婴儿和母亲的行为所发生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着

显著的差异,从而支持了这一相互作用的发展模式。

以上提到的关于儿童发展的跨文化概念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说明儿童发展的复杂过程,在指导抚养儿童的实践上也有重要意义。例如土耳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地位不利的儿童的心理发展^[14]。这一项研究的特点是,它并不直接对儿童提供丰富化的课程帮助,而是通过一个干预训练计划支持和改善儿童在其中生活的环境(主要是母亲),使环境能提供对儿童更好的帮助。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母亲的训练从而影响儿童发展的效果是很显著的,并且也改善了母亲的心理素质,使母亲在训练中也得到了好处。

(二) 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的跨文化研究

在中国关于儿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慢。80年代中期,左梦兰、王骥业等在中国云南、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他们应用了典型的皮亚杰学派的认知作业任务,比较了汉族和基诺、摩梭等少数民族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儿童认知发展显示出共同的规律,但他们也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差异。作者把这种差异归因于文化教育的质量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民族本身的差异。在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如关于中澳儿童对智力概念理解的对比研究,关于中澳两国儿童社会观点采择能力发展的对比研究^[16, 17]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 W. Stevenson领导的小学儿童学校适应能力的对比研究。参加这一项目的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三国的心理学家,被试样本取自北京、台北、仙台和芝加哥四个城市。来自不同国籍的心理学家在一起工作,他们制定了统一的数学、语文阅读的标准化测验试题和认知作业任务,评估了这四个地区儿童数学、语文的学业成绩和认知能力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亚洲儿童特别是中国儿童的数学成绩比美国儿童高。为了探查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者对儿童、他们的母亲和教师作了有关的问卷调查和随访谈话,并进行了课堂教学的现场观察。结果发现,不同文化社会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期望、教养态度及儿童本身的学习动机,学校课堂教学实践等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异^[18-20]。这一研究有助于了解有关各国学校教育的长处和弊端,并为有关教育行政部门改进小学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国际上,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依然是一个热门的课题。提交1988年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学会(IACCP)学术双年会的163篇论文中关于发展和教育的占41篇,其中关于认知发展和教育的占15篇。有几篇报告用皮亚杰的认知作业任务和有关的测验对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或不同文化社会的儿童作测查以比较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和认知风格上的差异^[21, 22]。关于儿童的语言发展方面, Honing和Park(1988)^[23]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影响生活在法国的美国人、非洲人和法国人家庭中的学步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因素,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的水平是对儿童语言正常发展的一个很好的预测指标,而生态环境(如住宅的人口密度,家庭人口数目等)与儿童语言的正常或延迟发展关系不大。

关于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研究这几年没有重要的突破。Dasen在他主编的“皮亚杰学派的心理学: 跨文化贡献”(1977)^[24]一书中曾提出了皮亚杰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并预期“这一理论的质的方面(即基本的认知过程,阶段的结构特点及它们的层次结构次序)应该是普遍的,如果说它的量的方面(儿童发展通过相继次序的各种水平的年龄)不

是普遍的话”。近年来的有关研究结果似乎支持了这一设想。

(三) 关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跨文化研究

近年来许多关于婴儿期和婴儿—母亲相互作用的跨文化研究是在日本进行的^[26,26]。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领域中研究过的课题较为重要的有自我概念的发展^[27],互助行为^[28],儿童—父母关系的因素结构^[29],儿童对成人常模的认识^[30],调节儿童行为的母亲策略^[31]和攻击行为的稳定性^[32]等。

在儿童社会—道德发展领域近年来也进行了不少研究。以色列的一些研究报告表明,道德推理受思想意识的训练的影响,并且可能反映了语言的熟练程度^[33,34]。某些研究发现在传统文化的边远地区儿童的道德发展和习俗道德水平较低,这与上述研究的结果一致^[35]。Snarey(1985)^[36]在他的一篇综述报告中,综合了27个文化地区的45个研究,提供了支持Kohlberg研究假设的证据,但他指出主要问题是阶段的一般应用范围存在着城市和中产阶级的偏差。

Hoffman(1987)^[37]认为父母对儿童的价值观构成了儿童抚养行为的基础。他对9个国家的儿童价值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期待儿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价值(如养老等)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Per-ris等(1985)^[38]应用一种内省的自我报告作工具测查了欧洲五个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测试,分析出父母对子女的三种不同教养态度:感情温暖,拒绝和过度保护。但这对非西方文化国家是否适用有待于研究。另一些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的控制究竟被儿童看作是父母对他们的拒绝或接受视儿童生活的文化背景而定。例如在父母的行为一般是严谨的社会(如日本、朝鲜)中,儿童认为父母对他们的控制不是拒绝,而是关心。但在父母的行为是宽容和随意的社会中(如美国和德国),父母的控制则被儿童认为是拒绝^[39-41]。

由于篇幅关系以上只是举例性地论述了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最新进展。从近年已进行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发展趋势。

1. 本土心理学的提倡: 本土心理学得到提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三世界的心理学家十分关心心理学为本国发展作出贡献^[42,43]。有些还明确提出心理学的研究应把重点放在解决社会实践提出的问题上^[44,45]。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心理学感到不满,认为西方心理学家偏重于纯科学的研究,即依据西方的理论和数据资料探讨普遍性,而忽视文化差异和应用研究。推动心理学本土化的另一种动力来自西方的研究者,他们认为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本土的心理学知识对发展真正普遍的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普遍性正是从各种特殊性中概括出来的共同行为模式。我们知道人类学在传统上是探讨特殊性的,心理学家在探讨本土知识的时候,正在发展一种将心理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46,47]。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强调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指导研究,强调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应由“中国儿童自己说话”的观点是十分突出的^[48,49]。

2. 主张对普遍性的研究: 与提倡本土心理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部分心理学家强调探讨对人类普遍适用的心理机能特点。如Amir和Sharon(1987)^[50]企图通过实验研究探讨社会心理学规律的普遍性。在认知领域工作的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认知机能在行为水平上的表现是基本的普遍过程的文化产物,因而可能显示出文化上的差异^[51],但他们要探讨的是基本的认知过程和机能。在个性领域中,Eysenck(1986)^[52]声称他提出的因素比

较指标在他研究过的24种文化中是普遍适用的等等。

3.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最近几年来提供的研究证据表明^[53-55],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是决定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的两种基本不同的文化变量,来自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表现出个人主义的价值和行为,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个体则有相反的表现。研究者越来越感兴趣的是,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变量如何对儿童个体的心理机能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方面的科学资料正日益增多,1990年7月在南朝鲜的汉城还举行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

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不仅对探讨环境与遗传关系的基本问题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对儿童的抚养和教育有重要实践价值。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方法学问题,而跨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在方法学上占有中心位置。跨文化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近年来有长足的进展,关于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提倡本土心理学或主张探讨普遍性是当前跨文化心理学的两种主要趋向,与此对应存在着主位和客位两种研究方式的论争。但不能认为这两者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因为不研究特殊性就无法发现普遍性,而只有依据对某种普遍性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特殊性区分开来。研究的侧重点可以不同,但均能对跨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Kagitcibasi, Cigdem and Berry, J.W.,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urrent Research and Trends. I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9, Volume 40.
- [2] Liu F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n China: Some ancient thoughts and recent advances, Proceedings of China Satellite-ISSBD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1987.
- [3] Malpass, R. S. and Poortinga, Y. H., Strategies for design and analysis. In W. J. Lonner and J. W. Berry (Eds), Field Method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1986.
- [4] Drannes, J. G., Culture and Psychopathology: What is known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6, 38 (3), 329-338.
- [5] Cashmore, J. A., Goodnow, J.J., Influences on Australian Parents' Values: Ethnicity versus socioeconomic status. J. Cross-Cult. Psychol, 1986, 17: 441-54.
- [6] Berry, J. W. Introduction to methodology, In H. C. Triandis & J. W. Berry (Eds), Handbook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Vol. 2), Boston, Allyn & Bacon, 1980.
- [7] Triandis, H. G., Malpass, R. S., & Davidson, A. 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1-84, In Bienni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Palo Alto: Annual Reviews, Inc., 1971.
- [8] Werner, E. E. cross-cultural child development: A view from the planet earth, Monterey, Calif: Brooks/Cole, 1979.
- [9] Keats, D. M. and Fang, F. X., Cultural factors in concepts of intelligence, In Kagitcibasi, D. (Ed), Growth and progres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esse. Swets and Zeitlinger, 1988.
- [10] 方富熹, 齐茨 (D.M.Keats), 关于智力概念理解的跨文化对比研究, 心理学报, 1987, 3.
- [11] Super, C. M., Harkness, S., The developmental niche: a conceptualization at the interface of child and culture, Int. J. Behav. Dev., 1986 9: 545-70.
- [12] Dasse, P. R., Development psychologique et activites quotidiennes chez des enfants Africains, Enfance in press, 1988.
- [13] Shand, N., Kosawa, Y., Culture transmission, Caudell's model and alternative hypotheses, Am. Antropol., 1985, (87): 862-71.
- [14] Kagitcibasi, C., The Turkish early enrichment project, Paper presented to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wcastle, Australia, 1988.

- [15] 左梦兰, 是文化差异还是民族差异? 刘范张增杰主编: 《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245—264页, 1985.
- [16] Fang, F. X. and Keats, D. M., "The Master and Wolf": A Study in development of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i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hildren, In D. M. Keats, D. Munro and L. Mann (Eds): *Heterogeneity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Selected proceeding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esse, The Netherland, Swets and Zeitlinger, 1989.
- [17] Keats, D. M., and Fang, F-X, Effects of mod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stimulus materials on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ability of Chinese and Australian children, Paper presented to 10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ara, Japan 1990.
- [18] Stevenson, H. W, et a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of 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ld Development*, in press, 1990.
- [19] 方格, 佟乐泉, 刘范, 三四城市小学儿童数学成绩的比较研究, *心理学报*, 1988, 3.
- [20] 方格, 佟乐泉, 刘范, 中美儿童数学成绩差异产生的原因探查, *教育研究*, 1990, 4.
- [21] V. Kalyan-Masih,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styles of white American and non-white immigrant children,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wcastle, Australia, 1988.
- [22] Sinha, D. & Shresitha, A. B., Ecocultural factors in cognitive style among children from hills and plains of Nep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wcastle, Australia, 1988.
- [23] Honig, A. S. & Park, K. J. Correlates of Language competence among toddlers in North American, African, and French families in Franc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Newcastle Australia, 1988.
- [24] Daseñ, P. R., *Piagetian psychology: Cross-Cultural Contributions*. New York: Gardner Press, 1977.
- [25] Shand, N., Culture's influence in Japanese and American maternal role perception and confidence, *Psychiatry*, 1986, (48): 51—67.
- [26] Otaki, M., Durrett, M. E., Richards, P., Nyquist, L., Pennebaker, J. W., *Maternal and infant behavior in Japan and America: A Partial replication*, *J. Cross-Cult. Psychol.*, 1986, (17): 251—68.
- [27] Pang, V. O., Mizokawa, D. T., Morishima, J. I., Olstad, R. G., *Self-concepts of Japanese-American children*, *J. Cross-Cult. Psychol.*, 1985, (16): 99—109.
- [28] Tyler, F. B., Verma, M., *Help-seeking and helping behavior in children as a function of psychosocial competence*, *J. Appl. Dev. Psychol.*, In press, 1988.
- [29] Bronstein, P. *Children's social behavior: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Int. J. Behav. Dev.*, 1986, (9): 439—53.
- [30] Ekstrand, L., Ekstrand, G.,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norms and sanctions in two cultures*, In Kagitcibasi, C. 1987c. *Alienation of the outsider: the plight of migrants*, *Int. Mig.* 1987, (25): 195—210.
- [31] Sinha, S. R., *Maternal strategies for regulating children's behavior*, *J. Cross-Cult. Psychol.*, 1985, (16): 27—40.
- [32] Eron, L. D., Huesmann, L. R., *The stability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In Kagitcibasi, C. 1987c. *Alienation of the outsider: the plight of migrants*, *Int. Mig.*, 1987, (25): 195—210.
- [33] Snarey, J. B., Reimer, J., Kohlberg, L., *Development of social-moral reasoning among Kibbutz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cross-cultural study*, *Dev. Psychology*, 1985, (21): 3—17.
- [34] Fuchs, I., Eisenberg, N., Herz-lazarowitz, R., Shrabang, R., Kibbutz, Israeli city, and American children's moral reasoning about prosocial moral conflict, *Morrill Palmer R.*, 1986, (32): 37—50.
- [35] Tietjen, A. M., Walker, L. J., *Moral reasoning and leadership among men in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Dev. Psychol.*, 1985, (21): 982—92.
- [36] Snarey, J. R.,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of social-moral development: a critical review of Kohlbergian research*, *Psychol. Bull.* 1985, (97): 202—32.
- [37] Hoffmann, L. W., *The value of children to parents and child rearing patterns*, In Kagitcibasi, C. 1987c. *Alienation of the outsider: the plight of migrants*, *Int. Mig.*, 1987, (25): 195—

- 210.
- [38] Perris, E., Arrindell, W. A., Perris, H., Van der Eade, J., Maj, M., et al., Cross-national study of perceived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in healthy subjects from Australia, Denmark, Italy, the Netherland and Sweden: Pattern and level comparisons, *Acta Psychiatr. Scand*, 1985, (72): 278-82.
- [39] Trommsdorff, G., Some comparative aspects of socialization in Japan and Germany, In Reyes-lagunes, I., Poortinga, Y. H., (Ed) *From a defferent perspective: Studies of Behavior Across Cultures*, Lisse, Swets, & Zeitlinger, pp. 231-40, 1985.
- [40] Pettengill, S. M., Rohner, R. P., Korean American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arental control, parental acceptance rejection and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In Reyes-lagunes, I., Poortinga Y. H., (Ed) *From a defferent perspective: Studies of Behavior Across Cultures*, Lisse, Swets & Zeitlinger, pp. 241-49, 1985.
- [41] Rohner, R. P., Pettengill, S. A., Perceived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parental control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 *Child Dev.*, 1985, (56): 524-28.
- [42] Sinha, J. B. P., *Work-related values and climate factors*, *Int. Rev. Appl. Psychol.*, 1986, (35): 63-78.
- [43] Moghaddam, F. M., *Psychology in three worlds, as reflected by the crisis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move toward indigenouse Third-World psychology*, *Am Psychol.*, 1987, (42): 912-20.
- [44] Connolly, K., *Can there be a psychology of the Third World* *Bull. Br. Psychol. Soc.*, 1985, (38): 249-57.
- [45] Moghaddam, F., Taylor, D. M., *What constitutes an "appropriate psychology"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 J. Psychol*, 1986, (21): 253-67.
- [46] Rogoff, B., *Adult assistance of children's learning, In the Contexts of School-Based Literacy*, ed. T. F. Raphael, pp. 27-4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
- [47] Rogoff, B., *The joint soci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by young children and adults, In Social Influences and Behavior*, ed. M. Lewis, S. Feinman, New York: Plenum, 1987
- [48] 朱智贤, 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44页, 1982.
- [49] 刘范, 张增杰 (主编), 儿童认知发展与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26-27页, 1985年.
- [50] Amir, Y., Sharon, I., *Are Social psychological laws crossculturally valid* *J. Cross-Cult. Psychol.*, 1987, (18): 383-470.
- [51] Poortinga, Y., van der vijver, F., *Culturally invariant parameters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 In Berry, J. W., Annis, R. C., (eds) Ethnic Psychology*, Lisse: Swets & Zeitlinger, pp. 19-36, 1988.
- [52] Eyseack, H. J.,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The validity of assessment by indices of factor-comparisons*, *J. Cross-Cult. Psychol.*, 1986, (17): 509-15.
- [53] Kim, U., *Personality,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cognitive style: A preliminary study with Korean-Canadians*, Presented at *Int. Assoc Cross-Cult. Psychol. Confr.*, 8th, Istanbul, 1986.
- [54] Sinha, J. B. P., Verma, J., *Structure of colletivism, In Kagitcibasi, C. (ed) 1987a Growth and Progres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isse, Swets & Zeitlinger, pp. 123-29, 1987.
- [55] Forgas, J. P., Bond, M. H.,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perception of interaction episod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83, (11): 75-88.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ETHODOLOGY AND CURRENT TRENDS

Daphne M. Keats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Fang Fuxi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cademia Sinica, China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ould contribute much not only i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eredity in explaining ment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the practice of rearing children.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methodology, otherwise the data obtained would be invalid.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methodology would be cross-cultural comparability. Questions of cultural equivalence permeate cross-cultural methodology. Several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cross-cultural comparability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Many studie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ization of children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s of social-cultural variables of individualism or collectivism on the child's development are being increasingly investigated, advocating the indigenisation of psychology and emphasizing on exploring the universality becomes the main trends. Research approaches of emic and entic have given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 however they are not contrary to each other, they are compensatory because universality can not be found if one does not study the culturally specific, and the specific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until we know something about universality. As research strategy one might emphasize one approach or another, but both would give contributions to cross-cultur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